

# 视觉化呈现中国深历史

秦岭



摘自《何以中国: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上海广播电视台出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美】苗德岁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 为达尔文代言 点亮科学之光

宋华丽

恩格斯曾赞誉19世纪自然科学有三大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其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颠覆了上千年来人们对地球生命(尤其是人类自身)的认知,引发了思想史和科学史上的革命。阐释这一理论的《物种起源》被称为一部改变人类进程的科学巨著。

放眼全球,自《物种起源》问世160多年来,有关达尔文的研究数不胜数,达尔文与进化论几乎成为一门显学。在汉语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近代以来便是国人熟悉的话语,并不断被演绎,而进化论是中学校教科书中“必背”知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了专业学者,真正读过《物种起源》的读者少之又少,对于达尔文其人的生平经历和人物形象也不甚熟悉。可以说,达尔文是广大中国人心中“熟悉的陌生人”,需要行家带领大众“零距离接触”。在汉语世界,这一行家便是《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书的作者、古生物学家苗德岁先生。

### 用鲜活的史实还原达尔文形象

十余年前,苗德岁先生翻译了《物种起源》,包括原著第二版和第一版的全译本,与早期翻译家叶笃庄等人的《物种起源》中译本同为市面经典,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后来,苗德岁又陆续创作了《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地球史诗》《生命礼赞》等十余部科普读物,并应邀为达尔文的多部中译本作品撰写序言或导读。

讲科学家故事的出发点是尊重史实。《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书基于大量一手资料,以时间为主线,层层推进,塑造了一位鲜活的科学巨人形象。作者从达尔文的家族积淀、少年博物时光讲起,到青年时代辗转求学、受到多位科学导师启蒙、跟随小猎犬号五年科考,再到科考归来后反思自然观念、静心创作《物种起源》,并穿插《物种起源》等多部经典作品解读,直至达尔文的晚年创作与科学巨匠的陨落,讲述了达尔文一生带给后人的启示,宛如一株枝繁叶茂的达尔文研究之树。

书中呈现了气势恢宏的科学史主题,比如,作者将达尔文的研究生涯分为“小猎犬号环球科考归来”“隐居”著述,使读者清晰地看到:达尔文怎样由一个信奉“物种不变论”的年轻人,经过对南美洲等地生态、化石持续的探索,在对地质学先驱莱尔“渐变论”的理解过程中,一步步产生怀疑,形成自然选择、万物共祖等演化思想。

苗德岁在这部传记中不仅严谨地化史实为故事,还厘清了一些常见的误解,比如,达尔文并非在五年小猎犬号旅行过程中产生“顿悟”,而是在五年科考过程中产生疑问,归来深入研究后才一步步找到答案,这也更符合科学认识的一般规律;又如达尔文迟迟没有发表物种理论的原因,并非只是一般认为的“担心引起巨大争议”,而是他决意继续搜集证据,尽力完善自己的理论。

### 永不磨灭的科学精神

科普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传递新知,更在于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家精神。透过达尔文的“物种之眼”,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科学研究——如达尔文所言:“科学研究就是要综合事实,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句话至今仍仍是科学研究的真谛。达尔文与亨斯洛教授的博物交流,他在小猎犬号科考中表现出的好奇心、对科学发现的兴奋感、“见微知著”的观察力、精准洋美的描述能力、献身科学事业的志向,和创作《物种起源》时的严谨立论、沉稳例证、论辩能力,以及流畅精准的文笔、锲而不舍的精神、谦逊的态度、隐忍的性格等,成就了这位19世纪伟大的科学家。

### 科学与人文交织的光芒

苗德岁的科普作品一向有“孩子读了不觉深,大人读了不觉浅;外行读了不觉深,内行读了不觉浅”的美誉,阅读本书亦有同感。

作者通过信手拈来地引用达尔文的著作、日记、书信等,不仅展现了达尔文作为科学巨匠的伟大,也从多角度刻画了达尔文的性格,比如对家人的温情、对科学家朋友们的慷慨援助、对黑奴等不同族群的人文关怀,等等。作者还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筛选了达尔文生平的趣味花絮,比如他小时候因医生父亲为病人诊断,年少医时惊悚逃离无麻醉手术引起患者惨叫的现场,在南美洲吃完小猎犬肉之后把骨头拼成完整的骨骼标本;他在印度洋小岛上看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返回英国的道路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可谓妙趣横生,毫无时代隔阂感。

这部以科学家为核心的传记作品,同时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闪耀着科学与人文交织的光芒。阅读本书带给人的印象是,苗德岁既是科学家、研究者,又像一位高超的讲故事高手,以说书的效果层层引入,铺设悬念,妙语连珠,引人入胜。达尔文笔下的严谨观察与诗意语言,穿越科学史的两百年历程,与作者苗德岁的“物竞天择”风格达成和谐的共鸣效果。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为读者打开了欣赏生命世界、走进科学殿堂的大门,吸引汉语世界的读者进一步了解达尔文。从眼前这部作品入手,再进一步读达尔文的经典作品《小猎犬号航海记》《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小众”的兰花作品、蚯蚓作品,“最易懂读”的《人与动物的表情》,必定是步步愉悦的心灵之旅。我相信,这本书可以带领读者进一步走进多姿多彩的生命科学世界,领略达尔文演《论之光》所照亮的生物多样性美景,并深刻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终极人生命题。

(作者为青岛出版社副编审)



字记载更为久远、丰富和复杂。当然历史的价值远远不止呈现,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是希望能回答“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将往何处”的终极问题。不同于世界其他远古文明,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发展至今的内在脉络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文字、礼俗、思想和民族精神能始终相承而未中断?这个文明古国如此强的韧性和生命力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造就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仅要延伸探索历史的时间维度,也要有观察古代社会的多重视角,更要能把握住历史变化的宏观节奏。而这些,都需要由考古学的重要发现与研究来实现。

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初衷是将最新的考古学发现和成果视觉化地记录下来。而现在这本书,去除了动态复原的历史场景,文稿的学术性和艺术性得到了更为凝练的呈现。我们可以很谦虚地说,支撑文稿形成的考古材料和观点都是非常前沿的,甚至很多还在研究当中。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兼具了学术性和前沿性的考古学成果来支撑、来帮助大家构建一部和以往的叙事有所不同的万年中国史。

纪录片的8集,也就是本书的8个章节,代表了我们对这个长尺度的中华文明简史里面最重要的那些变化节点。用一句话来说,这些变化节点就是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然后是中国青铜时代来自不同部族的三代兴替,一直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兴起,即“中国起源”。

全书的编排并不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第一章是首先给出一个答案,就是“什么是中国”。我们重新学习秦汉史,它的核心是什么?它对后世中国这种延绵不断的连续性的贡献在哪里?我们在第一章里先把这个结果说出来,然后再回到最早的人类起源的阶段,从史说起。

接着的7章,它的宏观节奏实际上可以从第五章《择中》这一里一切为二。《择中》和之前的3章,讲的是所谓的史前史,就是没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这样一个人类文化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个最大的命题:什么时候开始了农业?什么时候有了定居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社会不平等?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文明?这样的宏观变化是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是只有东亚地区才有。不同的区域,发生的时间节点和先后顺序还不一样。我们其实不用去攀比谁早谁晚,因为如果按照冶金术和文字起源的标准来看的话,两河流域文明或者古埃及文明,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所谓的文明成就上,节奏是比我们要快的。我们之所以要慢慢地来把这个宏观的节奏讲清楚,就是因为这些变化的节点一步一步地决定了“何以中国”,或者说我们祖先走过的每一步都在不停地回应“何以中国”这个问题,在每一个节点都解决了“中国最终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些核心性的问题,也就是夯筑了“何以中国”的根基。

后半段则是关于先秦史即周至秦的章节。这部分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已有知识可以来互文。从宏观层面,我们希望读者能看到中国走向一体化进程中的多元底色,夏商周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王朝更替,夏商周疆

域之外的早期中国也很精彩和重要,乃至到了周代,影响后世的礼俗制度逐步成形,不同的封国、不同区域之间,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实践。而这些多元性才是秦汉这样的一体化王朝最终能够形成的最主要的基础。

多元一体就像分子生物学中的双螺旋结构,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体两面,始终回旋交织着共生,它是人类遗传的基因结构,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基因密码。所以我们用考古学叙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非线性。

我们以往学习的历史可以用一根时间轴来理解,一个一个个时间坐标就像尺子上的刻度,无论疏密,它都是一个有明确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的线条。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觉得历史是要背的,哪一年发生了什么,哪一年又接着发生了什么。而考古学看到的历史不是一把标尺,时间是有形状的。中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时间的形状在万年历史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和具体。因此,在不同章节,考古发现会带着读者走向南北,看到我们祖先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早期中国不能被压在一条标注了年份的时间轴上,中华文明也并不是从一条涓涓细流里生发出来的。

中国历史为什么没有中断?为什么这样一脉相承?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韧性和生命力?这背后的核心并不是一体化这么简单。“一体”只是一个表象,一体两面的另外一面,就是多元。正是因为中国古代存在这样的多元性,在空间上和文化多样性上存在很大的腾挪空间,它才能够有这样的韧性,不断地在内部进行调整,自我修正,然后不断地继续往前。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考古学或者希望《何以中国》可以带给大家的:对历史的理解不是线性的,而是全面的、多元的。

除了长尺度的历史、非线性的历史,还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考古学可以让读者真正地贴近历史、看到历史的真实性,这就在于我们观察的多重视角和实证方法。多重视角不光体现在历史细节的真实感上,也有意识地在整个文本里面加重了一些小人物的视角——我们用了很多的出土文献、简帛文字,它们都是被无意识地留下来的,承载了普通人的视角对当时社会作出的记载。

我们的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从出生到成长,有挫折坎坷,也有高光时刻。在每一集每个章节中,我们选择的叙事人物也是从少年、青年逐步走向成年,从远古到秦汉,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自己的成长史。

(作者为纪录片《何以中国》学术总制片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 从“被遗忘”到“被重估”的学术移民

徐成



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v, 1887—1939)是成长于沙俄,就学于法国,研究于中国的人类学家,他在中国北方民族的调查写作方面用力甚巨,并深度参与了民国时期中国人类学界的学科建设。但因史料的语言壁垒和星散四方,有关史氏的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中长期黯淡。华东师范大学王传教授的新作《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双重生命》,不仅填补了近代学术史的重要空白,更深入挖掘了早期人类学的中国化历程。

### 自由鸟般的迁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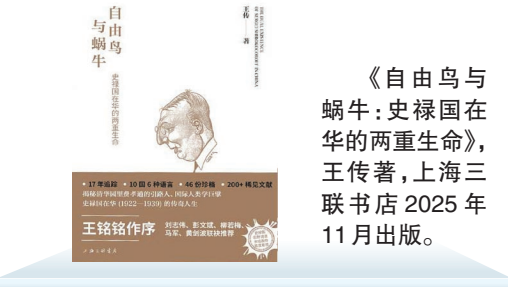
史禄国如自由鸟般跨越国界,脚步纵横欧洲,中国东北、华北、上海、闽粤、云南。史禄国在俄国与法国接受完学术教育后,受圣彼得堡学术界长期的远东学术志趣和传统影响,逐渐转移到西伯利亚和东方民族的调查上来。1912—1917年,在帝俄科学院效力的史氏与其夫人伊莉莎白,自由穿梭于圣彼得堡和远东之间,但沙俄的灭亡使他们原本的学术环境发生改变。1922年,史氏夫妇流亡上海。此后,史氏夫妇通过亚洲学会这一平台,广泛地结识了巴尔敦、梅益盛、葛学溥等名流,学者,并出版学术著作、做了体质人类学调查,还与上海探索学会、圣约翰大学等学术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在沪四年是史氏中国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使史氏由思考通古斯、东北亚为主的学术思路,转向对全体中国民族起源与民族志书写的思考。

史氏所之间辗转,结交了顾颉刚和张星娘两位在华引路人,并认识了以后长期支持自己在华工作的贵人傅斯年。可惜月有阴晴圆缺,史氏因为“云南调查事件”蒙上了临阵脱逃的名声,逐步被中国学术界边缘化。但傅斯年出于对史禄国治学理念、实际成就、研究计划的肯定,以及傅斯年本人对国际学术潮流的把握和争夺汉学正统中心的野心,选择聘任史氏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在此期间,史氏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人类学标准,出版了《中国人的身体发育过程》;还将自己早年在通古斯学领域的经验和资料,整理出版为《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举奠定学术地位。傅、史二人的合作,开创了史语所国际合作的悠久传统。但史语所毕竟草创未久,公家经费不足,难以长期支撑史禄国大规模的调查,旋即因史语所的北迁和李济的加入,史禄国的地位动摇,最终在1930年,傅斯年不再续聘史氏,将其逐出清华。

鸟儿般穿梭中国南北的史禄国,没有了史语所、傅斯年的支持,也未能再继续大规模的调查。不过冥冥之中似有定数,他在北平培养的弟子费孝通,在他被遗忘数十年之后,再次把史禄国的名字带回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之中。

### 蜗牛般的隐居与深耕

1930—1939年,史禄国隐居燕市,坚守学术阵地,这期间,他如同蜗牛一般缓慢而谨慎地展开自己的学术交往和学术研究,在自己以往的学术领地上锲而不舍地深耕。史氏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交往基本围绕自己的直接学术关系来展开,尽量避免冗余社交。本书通过对史禄国和阿



《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双重生命》,王传著,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11月出版。

理克书信的考察,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性情中人的史禄国,他不是所谓的怪人,而是一个待人真诚,充满热情而又有原则的学人。

他的真诚可从与费孝通的交往来证明:面对难得的人类学苗子费孝通,史氏爱才如宝,给费氏设定了严格的人类学训练计划。他打算从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四个方面对费加以教导,并狠抓费氏的自主实践能力,典型案例就是费氏1934年对北平军营和监狱八百余人的体质测量。1935年,史禄国又安排费孝通、王同惠夫妇赴广西调查,并亲自为小两口定制了德国精制长筒皮靴——正是这双皮靴使费氏摆脱了调查时落下终身残疾的风险。史禄国爱弟子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而费氏也最终不负师教,他在史禄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为中国民族学发展和民族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可以说,费孝通传承了史禄国的重要学脉,继承了史氏的治学精神。

随着中国人类学本土化不断发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史禄国学术遗产的深远影响愈加明晰,对史禄国学术生命探讨的重要性愈加突出。从这一角度而言,本书可谓一部杰作,切中肯綮地将史禄国这个“学术侠客”的鲜活样本还原出来,弥补了中国人类学史上的一块重要拼图。史禄国的一生,本身就是人类学的绝佳案例,他既是殖民时代知识生产的参与者,又是政治动荡中的边缘流亡者;既是欧陆学术传统的继承者,又是中国人人类学的播种人。他的学术轨迹本身便是文化接触、思想迁移与学科范式变革的活态标本,是知识跨越地理国界和意识形态的缩影。